

610

商丘文史资料

陈俊生题

政协商丘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商丘文史资料

第三辑

蔡昌瑞 主编

二〇〇四年六月

商丘文史资料
第三辑
商丘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印张:7.25 插面:2 页
2004 年 6 月第一版
印数 1—4 000 册

准印号:豫内资商新通字[2004]2 号

《商丘文史资料》(第三辑)编辑部

编 审 张春学

副编审 张修起

主 编 蔡昌瑞

副主编 赵文德 张建华

责任编辑 陈华光

商丘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主 任 蔡昌瑞

副主任 张建华

委 员 王月仙 王金会 王学亮 王清健

尹书谱 庄桂森 刘正义 孙 民

肖献华 陈华光 孟祥杰 张永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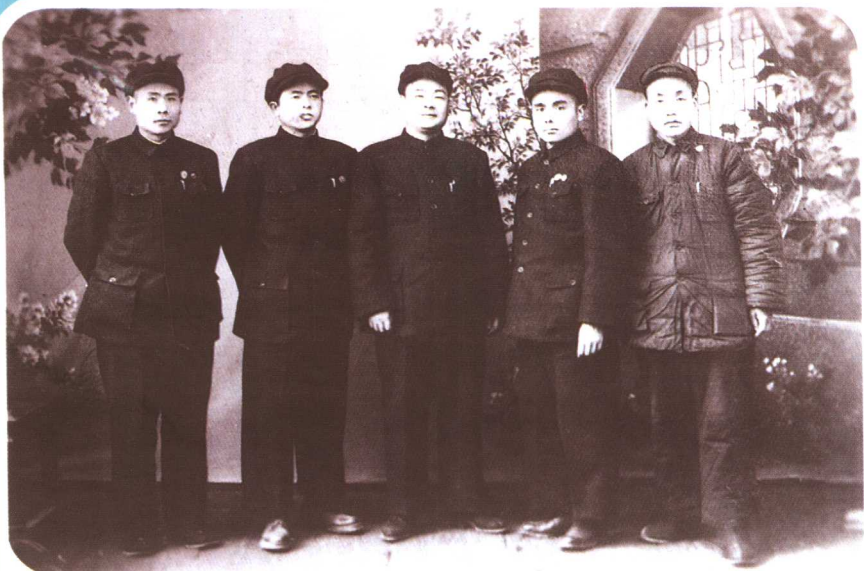
赵文德 贾长城 阎执荣 谢国启



王飞霄同志近照



王飞霄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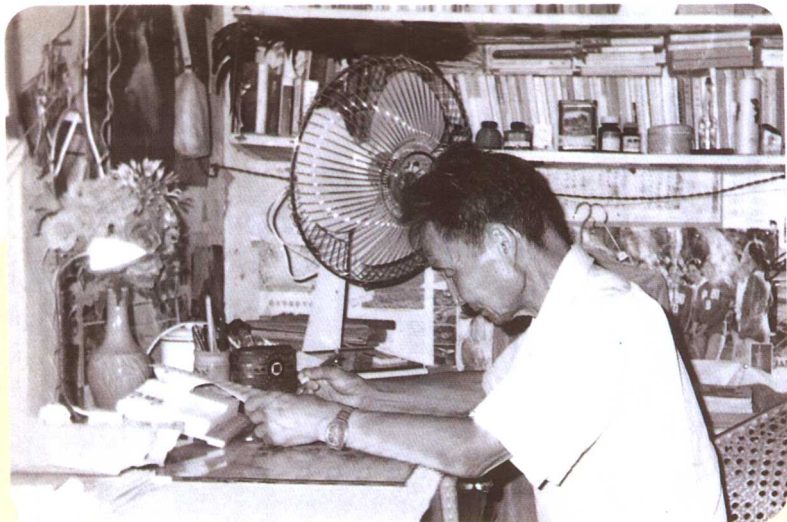
1950年摄于市委(左)丁建华 蒋光化 章正一 王飞霄 徐耀如

解放初期商丘市部分领导同志合影 84.9



商丘市初建时部分同志合影

左起：杨森 丁建华 雷文学 王飞霄 李志基 李子教 张洪泽



牛道一同志晚年在撰写回忆录《坎坷六十年》



1999年夏，牛道一及夫人王静忱(右一)与从台湾到大陆探亲的叔伯妹妹牛伟链女士(左一)合影。



1986年6月，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何竹康向牛道一颁发《河南省人民政府任命书》，任命其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1986年6月，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何竹康(前排左七)同河南省人民政府全体参事合影,(二排左四)为牛道一。

目 录

王飞霄回忆录

一、我的家庭	(1)
二、参加革命	(2)
三、在延安的日子	(7)
四、“小长征”	(12)
五、被俘与脱险	(19)
六、地下工作六年	(21)
七、艰难的柘城游击战争	(51)
八、当市长的日日夜夜	(71)
九、六年劳改学会了烧窑	(81)
十、二十五年的教学生涯	(84)
十一、拨乱反正,平反昭雪	(89)
十二、夕阳余辉	(92)

牛道一回忆录

一、我的出生及家庭成员简介	(92)
二、漫长的中学求学之路	(102)
三、大学时期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	(109)
四、参加各种考察及学术活动	(117)

五、参加赴南京“献剑”活动	(120)
六、随学校流亡到大西北	(124)
七、在延安师范学校任职	(130)
八、从延安到重庆	(134)
九、主笔起草《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139)
十、重庆轶事及赴德留学	(146)
十一、升任苏鲁豫皖四省边区中将专员	(151)
十二、协助家兄策反张岚峰	(156)
十三、落下“叛党通共”的罪名	(160)
十四、遭软禁成为阶下囚	(165)
十五、经人多方斡旋获释	(169)
十六、脱离国民党加入民革	(173)
十七、策动浙江省省长陈仪反蒋未果	(179)
十八、策动张轸举起反蒋义旗	(181)
十九、从北京辗转转到沈阳	(190)
二十、入狱后接受劳动改造	(195)
二十一、被判死刑再次入狱	(199)
二十二、获宽释愿为祖国统一做工作	(205)
二十三、从大连转居湖南	(209)
二十四、得平反叶落归根回故里	(214)

王飞霄回忆录

一、我的家庭

我于1913年1月5日出生在柘城县岗王乡济渑池村。幼年时期,由于母亲善于料理,家庭生活处于中等水平。12岁那年,母亲去世,家里象塌了天似的,我也从此过上了苦日子。在柘城县城上高小时没有鞋穿,15华里的路程来回跑。清早起来吃点红薯,喝碗米汤去上学,上午在学校里没饭吃,下午放了学一口气儿跑到家。天天如此。从那时我就知道,困难可怕,但真正生活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没啥了不起,克服困难就是胜利。

父亲叫王树桐,1977年去世。他是前清秀才,兄弟五个,他最幼。祖父叫王静岫,年轻时家里很穷,他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大伯父,出生在一个草庵子里。祖父在柏岗集的染坊里当过学徒,出师后在我的家乡济渑池开了个小染坊,劳动强度很大,他和两个儿子都很能干,发了财,在济渑池第一个盖了瓦房。从第三个儿子开始,不让他们在染坊干活了,供他们上学。所以,后来他的三个儿子(包括我父亲)都成了前清的秀才。

我们这个家族在济渑池一带很有影响,祖父开染坊时就主张公平,主持公道,反对以强欺弱。门楼王有七、八百户姓王的,到济渑池集上要野蛮,欺负回民卖肉的。祖父和大伯们总是站在公正

立场上保护回民的利益,与大户人家作斗争,使济渎池这个小集镇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家庭教育坚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我爷爷去世后,我奶奶从早到晚拄个拐棍管理这个大家庭。我大伯的儿子无理给人家打架,奶奶召开家庭会议,叫他跪到院子里,我四伯父打了他几十白腊杆子。我奶奶发现儿子、媳妇作的不对就打,我亲眼看见她打我继母几巴掌。

我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成长,养成了坚持真理,主持公道的个性,也锻炼了越是困难干劲越大,在逆境中不屈服,不气馁的性格。

二、参加革命

1931年,我从淮阳省立第三中学毕业。本来想考师范,因为师范生每月有6元的津贴,可是那一年师范考试取消了,便没有考。当时,我哥在柘城县当个小职员,还有个叔伯哥家里好一点,凑和着叫我读完了三年初中。我家有30亩地,一年到头吃、烧都很困难。农历双日有集,赶集的人也很多,穿的都是破破烂烂,衣服、帽子没有囫囵的,夏天光着脊梁。好点儿的人家用芝麻换点油,用高粱荳子串个小铜钱儿沾着吃。1931年,柘城的农村经济一幅衰败萧条景象。那时候,我从思想上不愿意劳动,劳动者一年到头吃不饱饭。我的本家有一个人在吉鸿昌的部队里当旅长,经他介绍我到了这个部队的一个连里当了文书,驻在鸡公山,这支部队本来就是吉鸿昌出国留洋时留在麻城一带的。因为他的部下被蒋介石收买了,把吉鸿昌轰走了。为首的张印湘,黑暗腐败,军饷经常是几个月不发,当官的“喝兵血”,贪污军费,被蒋介石枪毙了。后来这个队伍又到长江北岸麻城一带打共产党。烧杀抢掠,什么都干。牵了老百姓的牛宰了吃,抓了女孩子做丫环仆女卖了。我不适应南方生活,有一二年时常发疟疾。不久调到军械处当文书。处长刘金章,有一篮子书。他经常说,人家有钱吃喝嫖赌,我有钱

都买成书,禁啥书我买啥书。我看过他的很多书,有茅盾、郭沫若、巴金、张天翼的著作,接触了一些革命思想。军械处有一个小勤务叫彭玉林,是从红军俘虏过来的小鬼,才十五、六岁,文化不高。他与人聊天时经常说红军里如何好,官兵平等,对待群众和气等,并且说有机会还要去当红军。中尉军需员彭少武也经常讲共产党好。部队里不时地有人开小差,不是回家种地去了,就是到苏区去了。国民党军队腐败黑暗,人们向往共产党,是大势所趋。我也决心离开这个地方。冬天有了机会,回到了柘城。为了生活,我在柘城县城戒毒所里谋到一个工作,还是当文书,每月十块钱。去掉两块钱的生活费,买了好多进步的书籍。生活比较稳定,看书成了我的最大兴趣。订了几份杂志,有邹韬奋的《生活周刊》、杜重远的《永生周刊》、还有《文学》、《世界知识》等。《文学》就是现在的《人民文学》的前身。

1935年,我的同学张润之在柘城县第二小学当校长,地点在远襄乡,学校规模有6个班,120多人。他聘请我到二小当教员,并且管事务,每月18块钱。工资不算少了。当时18块钱可以买一辆济南造的自行车。到二小工作后,我主持成立了读书会。开始有我、张叔威和县城一小的宋愉樵,后来又增加了赵寅宾(又名卫华)、周宽修等人。读书会成员互相交换自己订的杂志,共同阅读进步书籍,每星期日都要在一起谈心得体会,议论时事。我有个同学叫张非垢,在燕京大学上学,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去过延安参观,经常给我们写信,介绍进步书籍,成了我们读书会的顾问。张非垢后来参加革命,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解放后任国家体委副主任,1958年病故。读书会读了很多书,肖军写的《八月的乡村》,写东北义勇军的故事,我印象最深。

没有枪怎么抗日呢?我心里整天想着掌握一部分武器。1936年远襄镇的联保主任不干了,我们的校长为扩大学校的规模也想

着掌握一部分政权。在他的支持下我兼任了远襄镇的联保主任。那时候是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十保为一个联保。一个联保相当于现在的几个村委会。每保都有一杆枪,我掌握了十杆钢枪。那个地方离土匪窝子比较近,为此慈圣区派半个班武装人员驻远襄,加在一块儿就是二十多条枪了。

1937年春天,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给豫东每个县派三个民运指导员,任务是发动民众,准备抗日。张非垢很快写信让我与他们联系。来柘城的民运指导员是周可夫、尹志异、李健三个同志,都是东北大学逃亡的学生,带着很多书,他们住在柘城县文昌宫里。他们三个都是共产党员,但不在一个组织,互相不沟通。其中李健是柘城人,后来去西华了,走时给我一支湖北造钢枪。李健在解放后任四川省经委主任。周可夫回东北了,1939年我们见过一面。尹志异是回民,后来也去了延安。我们读书会的几个人都去找他们了。我和他们一起把抗日救亡的宣传搞得热火朝天。他们在柘城县一小、二小教师们唱歌,《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歌曲在城乡唱起来了。我以联保主任的身份集合壮丁请他们讲话,宣传团结抗日。区里开会,我带他们到慈圣镇,在全区的壮丁会议上讲话。在张非垢的家乡郭村岗,在济渎池村,用白灰写了大标语,宣传抗日。日本人是1938年6月4日到柘城县的,在这之前的柘城县已造成了浓厚的抗日气氛。徐州会战后,形势日见紧张,柘城随时有沦陷的危险,豫东各县的民运指导员,大都是外地人,都到了我家济渎池村。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有一天,国民党河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保安司令李正韬来到了柘城西22里官庄集,住在慈圣区区长张大任家。他带的几十辆太平车和商丘县保安团的兵住在一个小学校里,就在我家西边七华里。得知这一消息,我和民运指导员一行二十几个人,唱着爱国歌曲去找他们,向

他们要枪,组织地方抗日武装。李正韬接见了我们。他戴着金丝眼镜,柱着文明棍,胖脸小眼儿,穿着少将服装。周可夫提出,我们正在组织抗日,请专员留下一部分枪弹,加强地方武装。李正韬说:“你们青年人抗日不行,象这里的区长张大任,五十多岁了,有10多顷地,他可以组织抗日。”李健介绍说:“你应该把枪交给热血青年,象王飞霄,他有200多壮丁,是很大的抗日力量。”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李正韬骂商丘人的话,他说:“商丘人没有灵魂了!”他还说:“我搞的是流动政治,今天是柘城,明天就可能是永城。”实际上是为逃跑编理由。第二天,天不亮李正韬就带着人马向西南跑了,因为日本人已经到了永城。这个李正韬是蒋介石侍从室的武官,他一跑,县长、区长都跑了。我们这次没要到枪,都垂头丧气地回济渎池村了。

日军入侵中原地区,因为没遇到大规模地顽强抵抗,很麻痹大意。他们洗澡后,光着屁股睡觉,把武器随便放在别的地方。柘城县大股的土匪头子孙法景偷了日本人的好多枪,其中有一挺重机关枪。他找到我,要求与我“联合”。我想,与他“联合”只能被他吃掉,土匪头子欺压百姓,不可能真的抗日。我没有同意。我决心在原来二十多条枪的基础上努力扩充队伍。慈圣的区长跑了,临时区长是我的同学,我利用他的影响招兵买马。我的读书会的人都回家跑反了。我们到处收拢枪支、壮丁。照书本上写的词语宣传,抗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人不离枪,枪不离乡。”收了一些国民党散兵丢掉的枪,搞起了几十个人的抗日队伍。但是,这些人的素质太差,我一个人又没有经验,实在管不了。我在时,他们不敢为非作歹,我不在时,壮丁们见人家的马牵马,见人家的鸡吃鸡。有一次,我带着队伍在一个小庄上休息,张非垢的哥哥张福基去了,这个人很坏,说我组织抗日是逞一时之勇,成不了气候,不如自己回去看家护院。在他的鼓励下,郭村岗的一二十个

人走了。我从学校出来时有四块银元,这时也花光了,没有其他收入,人心不稳,这支抗日游击队伍仅坚持十几天就解体了。

组织抗日武装失败,我既伤心又苦恼,想去投奔延安,并且决心去延安以前给日本、汉奸点颜色瞧瞧。我叔伯姐家庄上有个麻溜子,给日本人赶集买鸡,我从区队拿了支手枪要打死他,因为他坐在一群逃反的妇女里面没有得手。我认识的两个吸鸦片烟的柘城人,丧心病狂地为日军服务,鬼子送给他们两个骡子。他们赶集去卖骡子,我叫俺村的人拦住他俩假装买骡子,我趁机开枪打死了他们两个,扔在河里叫大水冲跑了。

打死两个汉奸以后,读书会的成员都来找我了,我们决定去延安上学。有卫华,宋愉樵、张叔威。家里比较富裕的刚满16岁的王树宣听说我们是过黄河到西边上学,他和宋愉樵有亲戚,也跟着去了。卫华后来在重庆工作,省级干部。宋愉樵1947年当团长时牺牲在山西运城。1937年张非垢曾给我寄来延安抗大的介绍信,春节后叫我三弟带走了。我只记得必须到西安文化日报社找陈翰伯介绍。我们每人准备了15元钱,我是卖了自行车凑的钱。1938年8月,我们一行五人向延安进发了。

在我去延安前的两三天,发生过一件危险的事。那时候,我和老百姓一样,没事呆在家里,日军一来就跑反躲起来。日军从城里出来有个规律,早晨八点钟出来,到县城周围十几里去抓鸡,强奸妇女,干尽坏事,下午却很少出来。那一天,我和几个侄子爬到村东几棵桐树上往东看,观察日军是否又来下乡抢掠。高粱棵起来了,我们没有看到,实际上日军已经到眼前了。有20多个人,是个宣抚班,有武装,有翻译。他们先看到我们几个在树上,喝令叫我们都下来。可是我当时带着个小手枪,有几颗子弹。他们吆喝着从东来,我从树西边下来,在树根处用桐树叶把枪盖住了。他们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出什么事。

日军侵略中国准备得很充分，他们的宣传画都是从日本本土带来的，是当时最好的纸，里面都是骂共产党、攻击中国人民的话。

去延安时，因为黄河发大水，从淮阳到周口 60 多里路，我们每人花二块四角钱坐木船过去的。天下着大雨，淋得浑身湿透。我们坐一夜船，天明在周口吃了包子，又步行到漯河搭火车到郑州，转车到西安，一路都买了车票，到西安 15 元钱快花完了。在西安很顺利地到文化日报社找到了陈翰伯，他瘦高个儿，戴着近视眼镜，听我们自我介绍后，马上给西安城里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唐亮同志写了信。我们高兴地去了办事处。到后马上参加考试，检查了身体，5 个人被录取到三个地方。我、宋榆樵、张叔威上抗大，卫华去陕北公学院，王树宣上安吴堡青训班。

三、在延安的日子

从西安去延安时步行走 9 天，每天 90 里。我到抗大后被编到六大队一队。那时全国去延安的青年很多，抗大每天收一个队 100 多人。我们一队的指导员是姜达生（新中国建立后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队长是姜殿富。六大队的大队长是韦国清，壮族人。在延安，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从军民的吃饭穿衣，到同志们的相互关系，都与国民党统治区不一样，那种污浊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一点儿也没有了。到处都是愉快的、激昂雄壮的革命歌声。人人都是愉快、亲切的、充满友情的乐天派。上课前，校政治部干事首先教唱《抗大校歌》：“黄河之滨，聚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这歌词使人激动万分。开学的时候，听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一个报告。那是八月的一天上午，我们队的 100 多名学员聚集在延安师范学校西边的小操场上，听毛主席讲话。他穿着一套半旧的灰制服，头戴灰色八角帽，瘦高个子，跟着一个警卫员。他慢声细语地